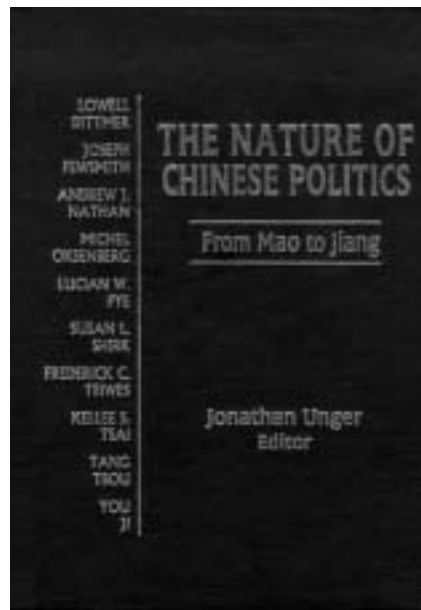


精英互動中的正式與非正式政治

● 朱德米

1973年黎安友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政治中的派別模式〉一文，首次提出用「派別衝突」來分析中國高層政治人物之間的互動。黎安友認為「派別」是垂直性的忠誠—庇護網絡和個人的關係結合在一起。它依賴於正式的結構，但又不受其限制，類似於「葡萄藤」。鄒讜提出用「非正式組織」來代替「派別」分析，避免落入中國特殊主義的窠臼。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1995年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 刊發了一期專門探討「中國精英政治」的論文，推動了精英政治分析模式的發展。這是從正式組織的權力架構和非正式關係兩者的互動來闡釋當代中國政治權力的運行和政治決策的過程，試圖破譯「中國政治的本質」。

從學術譜系看，1973年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政治中的派別模式〉(“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一文，首次提出用「派別(factionalism)衝突」來分析中國高層政治人物之間的互動。1976年鄒讜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政治中的非正式組織研究導論〉(“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一文對此進行回應。可是後來黎安友和鄒讜都沒有沿着這個方向繼續研究下去。儘管白魯恂(Lucian W. Pye)在1981年問世的《中國政治變化的動力》(*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中，從政治文化角度分析「庇護關係」提供了一種政治安全；但是這與黎安友從制度角度提出的派別模式是不同的。羅德明(Lowell Dittmer)在1995年發表的〈中國的非正式政治〉(“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一文裏，系統地提出了「非正式政治」概念和分析框架。白魯恂、泰韋斯(Frederick C. Teiwes)、鄒讜、黎安友等人對該文進行評論，進一步推動了該模式的發展。2001年《中國研究》又邀請一流專家對「精英政治框架下的正式和非正式政治」的

最新發展進行探討。2002年，這些研究成果匯集成《中國政治的本質：從毛澤東到江澤民》(*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下文標示之頁碼皆引自此書)一書。

這種分析模式首先是提出了非正式政治概念。黎安友認為「派別」是垂直性的忠誠—庇護網絡和個人的關係結合在一起。它依賴於正式的結構，但又不受其限制，類似於「葡萄藤」(trellis)。鄒讜提出用「非正式組織」來代替「派別」分析，避免落入中國特殊主義的窠臼。他在1995年還提出：

政治行動團體通常都是建立在正式制度結構和非正式網絡的基礎上。有時候，後者發揮着核心作用，把建基於不同分層和利益的各種團體加以聚合和組織。這種人際網絡可稱為派別。但它與黎安友所指的「派別」不一定相同，因為這一人際網絡可能包括了各種各樣正式和非正式的紐帶。這兩類政治行動團體以及人際網絡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但在中國，其地位和運作模式是不同於許多其他國家的。(頁139)

鄒讜的主張對該種模式的發展非常重要，避免了研究過程中形成一種對中國政治的「偏見」。

羅德明依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發展，在對派別模式進行學理評述的基礎上，總結了非正式政治的概念。他認為要為非正式政治下定義，必須從它不是甚麼來入手。換言之，對非正式政治的定義依賴於正式政治框架。在非正式政

治概念中，核心詞彙是關係 (*guanxi, relationship*)。他把關係分為價值理性關係 (*value-rational relationship*) 和目的理性關係 (*purpose-rational relationship*) 兩類。目的理性關係是以利益為基礎的，關係是實現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價值理性關係中關係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比如友誼等。關係包含着非正式的「政治基礎」，它是行使非正式權力的基礎，也可稱之為「勢力」。非正式的政治基礎可以從廣度和深度來度量。廣度主要指親密的網絡圈子在黨、政、軍等機構內分布的範圍，深度主要指支持的程度。簡要地說，非正式政治可以從行為、結構和周期來定義。從行為上來說，非正式政治包括為個人基礎服務的價值理性和目的理性兩種類型的關係。非正式政治是一種隱秘的關係，而不是公開的，它具有高度的靈活性、不規則性和權變性，無法進行制度化。從結構上說，非正式政治影響到領導層，而不是日常行政管理；影響到上層政治，而不是中低層政治。從周期上說，非正式政治通常出現在重大危機事件中，這些危機不是通過標準執行程序來解決，而是根據領導人的自由裁量權來解決。這些危機具有周期性，比如領導人繼承或領導層更換等，此時非正式政治活動就非常頻繁。

羅德明認為非正式政治與正式政治的關係是不斷變化和模糊的。非正式組織通常被同化在正式結構內，而正式結構的運行過程中伴隨着大量非正式性組織。在他看來，正式政治下所做出的決策僅僅是一種「表面」現象，其背後是非正式政

羅德明認為非正式政治與正式政治的關係是不斷變化和模糊的。非正式組織通常被同化在正式結構內，而正式結構的運行過程中伴隨着大量非正式性組織。在他看來，正式政治下所做出的決策是非正式政治互動的結果。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是：正式政治是葡萄架子，非正式政治是沿着這些架子蔓延的葡萄藤。

白魯恂指出：在中國，制約官員行為的既不是法律體系也不是道德命令，因而無法從正式和非正式關係的角度來為政治行為進行分類。於是，羅德明在構建解釋模式時便遇到困境。鄒讜認為羅德明的分析方法有兩個缺陷：(1)沒有考慮到上層領導的個性，特別是核心領導的個性在對政治決策的影響；(2)在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重疊的中間地帶存在着遊戲規則的可能。

治互動的結果。同樣，非正式組織也高度依賴正式組織體制，尤其是正式職位是非正式的基礎。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是：正式政治是葡萄架子，非正式政治是沿着這些架子蔓延的葡萄藤。

白魯恂在〈派別和關係政治：中國行政和政治行為中的悖論〉(“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一文中批判羅德明的分析框架。白魯恂對羅德明分析方法的核心範疇：政治中的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關係、價值理性和目的理性之間的關係，提出質疑。白魯恂指出正式與非正式關係主要運用在對行政行為和組織中的決策過程的研究。正式結構指組織的框架和法律安排，非正式結構主要指做出決策這之間的關係。在組織決策過程中，進行具體決策的人所擁有的權力與組織正式安排的職位命令鏈條之間通常是不一致的。由於政治與行政之間運行的邏輯不同，政治不存在着明確的組織邊界，在官方政治和非官方政治之間也無法進行劃分。日常的政治無法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間做出清晰的劃分。當然，白魯恂也認識到，在中國政治與行政是結合在一起的。他不是在這一點上向羅德明發問的。他指出：在中國，制約官員行為的既不是法律體系也不是道德命令，因而無法從正式和非正式關係的角度來為政治行為進行分類。於是，羅德明在構建解釋模式時便遇到困境。但是對「從非正式政治」，即人際關係的角度來認識中國政治，這一點白魯恂是非常肯定的。他甚至還認為整個中國政治總體特徵帶有

強烈的非正式性。其原因是中國政治系統的特點有：(1)制度化程度不足，(2)不是依據法律體系來運行的，(3)主要是在保密狀態並且在公眾監管之外進行運行的。白魯恂還指出，中國行政系統的運行也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同樣，價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的關係在中國政治運行的過程中也難以清晰區分。他指出，從關係紐帶的角度看，中國政治的轉型在於利益表達得到承認。由於在中國高層官員的行為約束機制中，道德、法律和敬畏觀念不佔主導地位，而是更多地依賴其他人權力的約束，所以「關係成為合法性的基礎」。

鄒讜在〈中國高層政治：派別或非正式政治？權力平衡或贏者通吃？〉(“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or a Game to Win All?”)一文裏，評論了黎安友、羅德明和白魯恂等人的觀點。他指出，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基本元素是庇護主義的領導—追隨者紐帶，或非正式關係，行動的單位是派別，力圖揭示的是精英政治系統，即政治系統本身。鄒讜非常肯定羅德明研究中國政治的視角。他進一步地指出：「羅德明選擇非正式政治概念，可以進一步探索中國面臨的一個基本的歷史問題：國家構建的過程和制度化問題。」(頁102)因為在中國國家構建和整個社會重構的過程中，制度化的過程一直沒有完成。制度化可以看成是正式政治和正式關係主導非正式政治和非正式關係的過程，也就是非正式政治轉化為正式政治的過程。鄒讜認為羅德明的分析方法有

兩個缺陷：(1) 沒有考慮到上層領導的個性，特別是核心領導的個性在對政治決策的影響；(2) 在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重疊的中間地帶存在着遊戲規則 (the rule of game) 的可能。鄒讜對該模式的發展主要是提出了派別互動在不同時期裏，形成了「贏者通吃」或「達到一種暫時的平衡」。

2001年，《中國研究》又邀請健在的這些專家，就幾年來中國精英政治的變化和發展進行學術討論。白魯恂、羅德明、泰韋斯等人繼續在精英政治的框架下，分析中國高層政治中的正式與非正式政治的相互關係。精英政治的變化和發展主要體現在正式政治或制度化程度在不斷提高。隨着革命一代政治家相繼逝世和不再直接干預決策，以及高層領導的任期制和退休制的確立，正式的職權日益重要，主要機構在決策過程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中國高層政治向理性、常態和可預測性方向發展。有的學者還指出，在高層政治精英的循環過程中，功績標準日益代替庇護標準。泰韋斯在〈中國特色的常態政治〉(“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繼續沿用「常態政治」(normal politics) 分析概念，他指出：

處於至少已部分制度化的體系頂端的領導人，面臨着無數的問題和壓力，卻沒有現成的意識形態來指導他們如何應對。為了維持某項政策的推行，或取得對某一個人或領導集團的支持，領導者就須要將各種不同的利害關係加以整合，匯聚成某種一致或不大一致的工作計劃，以滿足各方。(頁239)

領導的權力與他對問題解決的能力是聯繫在一起的。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 在〈江時代精英政治變化的動力〉(“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一文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領導小組、中央政策研究室這些機構在決策過程中的作用在不斷提升，所以中共高層決策開始向「一個更具協商性、共識性和理性的過程」方向發展。

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運用正式和非正式框架來研究中國政治，是否解決了海外學者研究中國問題所面臨的「分析的困境」呢？也就是說，是否在文化分析和制度分析之間尋找到平衡點。黎安友等人試圖在〈從新制度主義視角看中國政治中的派別主義〉(“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from a New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一文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指出：「在我們看來，派別主義模式的許多問題都根源於它在解釋政治行為方面沒有在結構(或制度)和文化變量之間進行成功的區分。」為了分析的需要，黎安友等人對結構(制度)和文化下了明確的定義。結構，作為激勵模式，來自行動者頭腦外；文化，作為態度、價值和信仰，來源於行動者頭腦裏。結構主要是環境的一個部分，文化則是一種主觀認識的一個部分。以往的派別研究常常受分析視角的影響，堅持制度視角的人把文化變量的影響排斥在研究議程之外；堅持文化視角的人，則把制度變量排斥在分析框架之外。如果想令「派別模式」成為研究中國政治的一種主導範式的話，那麼就必須把文化／制度融合在一起。在政治

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海外學者研究中國問題所面臨的「分析的困境」，關乎如何在文化分析和制度分析之間尋找到平衡點。解決困境的辦法就在於歷史制度主義理論的發展，當我們把制度和文化當作是一種影響行為的兩個變量時，派別政治模式可以在另一個邏輯層面上來認識，制度所提供的激勵和可能的選擇範圍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礎。

學界，剛剛興起的「新制度主義」為整合文化／制度分析的內在張力提供了一種可能。從文化／制度的角度看，羅德明把正式和非正式政治截然分開是有問題的。他們認為「社會和政治結構、過程、制度和關係幾乎既是正式的也是非正式的」。這樣一來，派別模式顯然遇到了困境。

解決困境的辦法就在於當前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發展，尤其是歷史制度主義理論的發展。制度有着歷史的基礎，它們能夠自主地影響着個體的行為選擇。當我們把制度和文化當作是一種影響行為的兩個變量時，派別政治模式可以在另一

個邏輯層面上來認識，制度所提供的激勵和可能的選擇範圍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礎。這樣，運用派別模式來研究中國政治就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儘管《中國政治的本質》是由一組論文構成的，但是與一般的論文集不同，其主題非常鮮明，力圖通過政治權力運行的過程來分析中國政治的本質。在這兩組不同時期論文的結集過程中，鄒讜和奧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 這兩位海外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相繼逝世。當理性和科學日益成為我們政治選擇主導力量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那些為我們提供「他者」視角的人們的努力。

知識份子改造的歧路

中共在1949年建國不久，曾與知識份子有過短暫的「蜜月」期，知識份子似乎從中共身上看到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曙光。朝鮮戰爭爆發、全民性的抗美援朝運動，也對知識份子的思想產生了很大觸動。雙方最初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三個問題上：第一是作家「寫甚麼」和「怎麼寫」的問題；第二是學術研究是否帶有「階級性」的問題；第三是大學教育指導方針中「通才教育」和「專才教育」問題。

● 董國強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在過去二十多年間，隨着相關專題研究論著、傳記資料和回憶錄資料大量湧現，「知識份子」問題成為國內學界一個熱點。不過根據筆者的印象，人們在談論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問題時，關注較多的似乎還是「反右」時期和「文革」時期。于風政的《改造》一書，將研究論述的重